



从七普 看中国 人口变化的 趋势和机遇



宏观热点洞见

毕马威中国

2021年06月

kpmg.com/cn

摘要

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以下简称七普）。此次人口普查的调查时间为2020年11月1日至12月10日，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对我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逐户逐人进行了普查登记。

人口普查是全面查清国家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的重要途径，中国目前为止进行了七次人口普查，分别于1953、1964、1982、1990、2000、2010、2020年进行。在现行统计制度下，人口普查每10年开展一次，尾数为“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其余年份进行人口抽样调查，其中尾数为“5”的年份进行规模较大的1%人口抽样调查，也称为“小普查”。需要注意的是，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的统计方法不同。人口普查以全体目标人群为调查对象，而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利用抽样比推算获得。相比之下，人口普查不存在抽样误差，漏登率更低，数据更为准确。因此，根据普查结果修正中间年份的历史数据亦是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之一。

人口普查为完善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七普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人口增速放慢，老龄化加速，而生育率较低。为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5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实施三胎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会议提出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通过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增强适龄青年的生育意愿，提高我国生育率。

本文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人口素质等方面对七普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中国人口变化的五个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经济的影响和市场机遇。

我们认为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可以用“一慢四快”概况：

- 人口增速放慢
- 老龄化加快
- 城镇化加快
- 人口流动加快
- 人口素质提升加快

人口和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中国人口变化对未来市场可能带来如下影响和机遇：

- 一老一小消费市场广阔
- 国货品牌快速崛起
- 社区养老和商业养老保险大有可为
- 自动化、智能化升级加速
- 人才红利推动创新发展

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以下简称七普）。此次人口普查的调查时间为2020年11月1日至12月10日，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对我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逐户逐人进行了普查登记。

人口普查是全面查清国家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的重要途径，中国目前为止进行了七次人口普查，分别于1953、1964、1982、1990、2000、2010、2020年进行。在现行统计制度下，人口普查每10年开展一次，尾数为“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其余年份进行人口抽样调查，其中尾数为“5”的年份进行规模较大的1%人口抽样调查，也称为“小普查”。需要注意的是，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的统计方法不同。人口普查以全体目标人群为调查对象，而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利用抽样比推算获得。相比之下，人口普查不存在抽样误差，漏登率更低，数据更为准确。因此，根据普查结果修正中间年份的历史数据亦是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之一。

人口普查为完善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本文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人口素质等方面对七普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中国人口变化的五个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经济的影响和市场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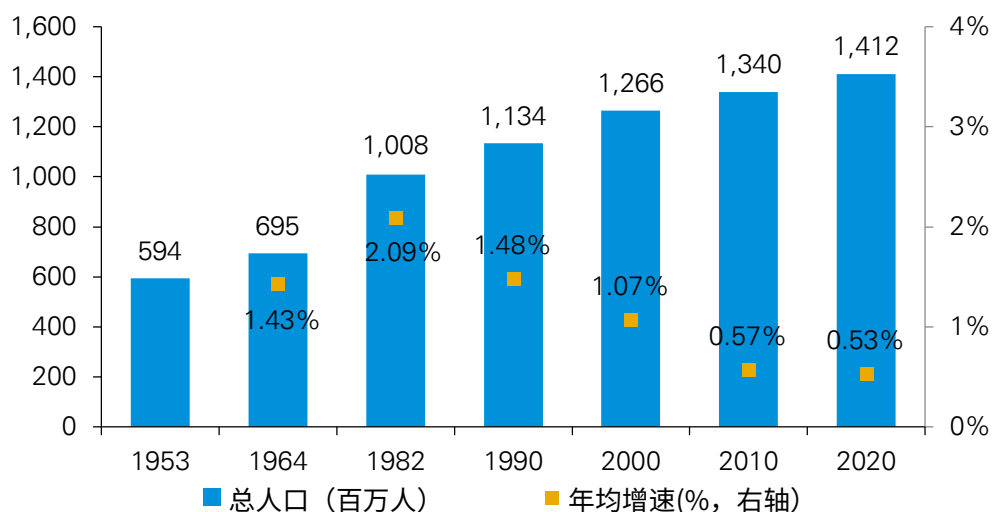
趋势一

人口增速放慢

我国总人口低速增长

从总体规模上看，我国总人口在2010-2020年间保持了低速增长的趋势。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共计14.1亿，较2010年六普的13.4亿增加了7,206万人，略低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2020年人口达14.2亿人预期。2010至2020年间，我国总人口年均增速为0.53%，较2000-2010年间0.57%的年均增速下降了0.04个百分点（图1）。随着建国早期高生育率带来的人口增长惯性逐渐消退，专家估计我国可能在2026-2030年间迎来总人口的“拐点”¹。

图1 中国历次人口普查总人口及人口年均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毕马威分析

生育率较低是人口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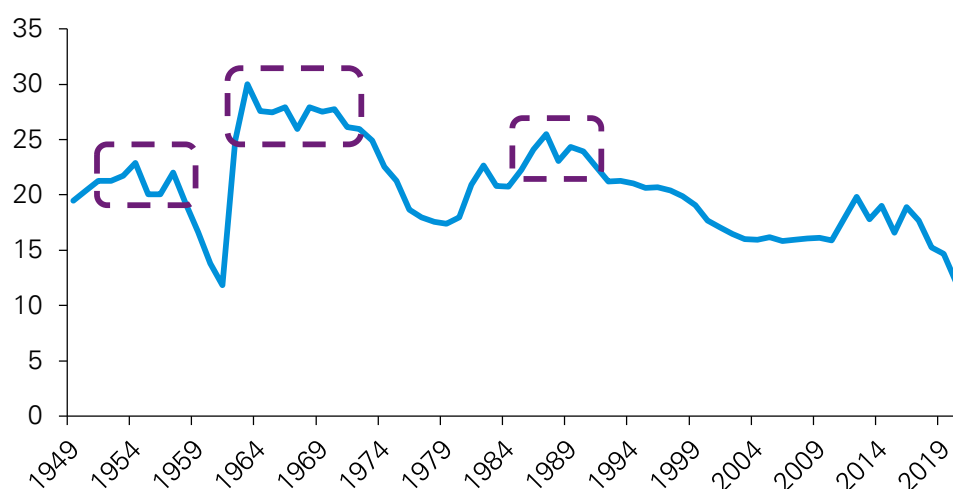
七普数据指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2.1的代际更替水平，进入1.5以下的“低生育率”区间。从国际上看，低生育率是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之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30个经济体曾总和生育率持续10年以上低于1.5，其中19个为发达经济体。2018年，全球仅有37%的中等偏上及高收入国家总和生育率高于代际更替水平。但是，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并非无法摆脱，德国在连续4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5后，通过提高育婴父母的福利、推动工作和家庭平衡、提高普惠托育水平、放宽移民政策等措施，使总和生育率于2015年回升至1.5，并在此后保持稳定。

¹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解读，经济日报，2021年5月12日，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105/t20210512_1817336.html

具体到我国而言，历史上，中国三次婴儿潮分别在建国初期、1962-1973年左右、1986-1990年左右出现，出生人数的波动存在明显的周期性，但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第四次婴儿潮并未在2010年左右出现（图2），且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在2011年达到约3.8亿的顶峰后持续减少，使2010年后出生人口直接进入下行区间。生育政策逐渐放宽使出生人口短期上升，继“双独二孩”、“单独二孩”于2011年、2013年相继放开后，2016年中国放开“全面二孩”，在2016年、2017年出生人口大幅增长至1,883万和1,765万人²，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升至2017年的50%左右。随着此前积累的存量释放，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回落，但出生人口中的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在2019年仍高达59.5%，“二孩效应”放缓但仍在延续，使得2020年0-14岁少儿人口占比较2010年回升1.4个百分点。

主观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也应该得到关注。七普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主观生育意愿为1.8，亦低于代际更替率。主观生育意愿的降低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现象，随着人口受教育年限延长，我国平均初婚年龄、女性初育年龄整体有所推迟。并且，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在职场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16至2019年间女性就业人员占比保持在43%-44%之间，使得生育带来的机会成本进一步提高，导致生育意愿降低。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生育、养育成本较高，特别是大城市中教育、医疗、住房给年轻家庭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值得关注的是，我国1.3的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1.8的生育意愿，完善生育政策降低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时间压力和心理压力，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有助于缩小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差距，提高生育率。

图2 出生人口数量，百万人



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统计摘要》，Wind，毕马威分析

² 原先公布的这两年出生人口数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七普后对该数据进行了修订。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105/t20210512_1817336.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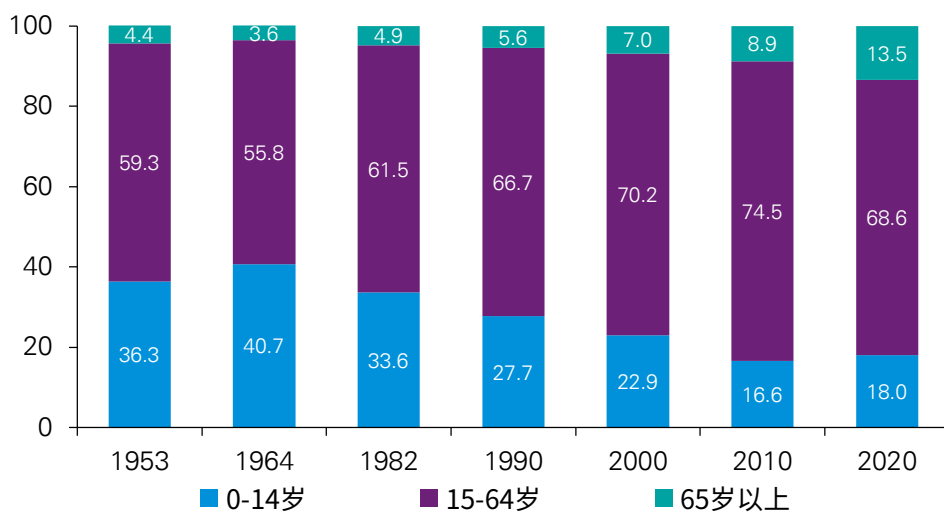
趋势二

老龄化加快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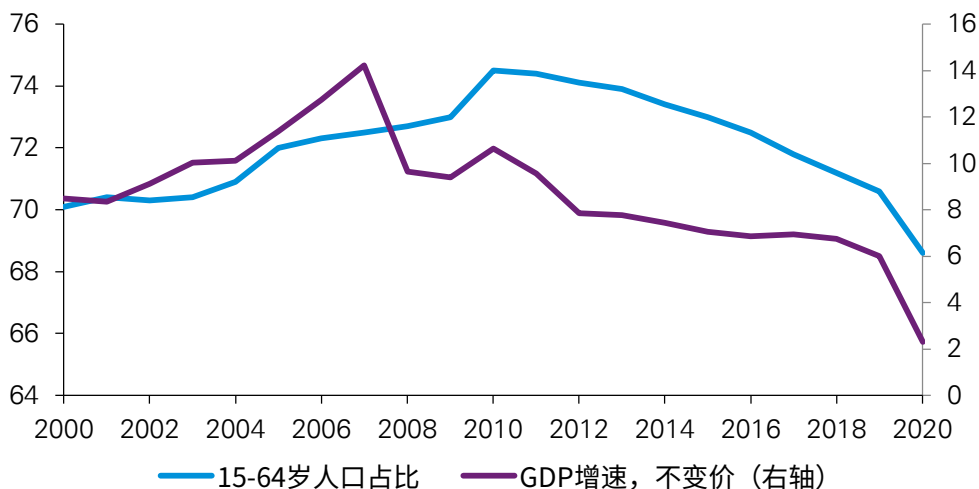
根据七普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和绝对量都出现下降。全国人口中15-64岁人口占比68.6%（图3），较2010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同时，15-64岁人口数量为9.7亿人，较2010年减少了3,000万。数据显示，中国15-64岁人口占比在2010年达到峰值74.5%（图4）之后开始回落。经济增速与劳动力人口增速密切相关。劳动力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劳动人口下降会加大成本压力，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未来随着第二波婴儿潮出生的人口逐步步入老年时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进一步下降，对宏观经济带来多方面影响。

图3 历次人口普查中各年龄段人口数量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毕马威分析

图4 我国15-64岁人口占比以及GDP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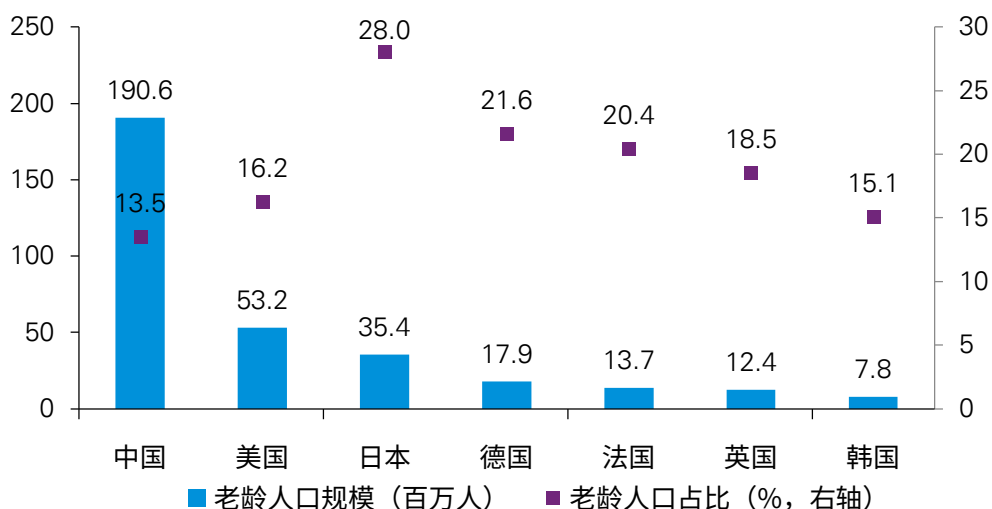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统计摘要》，Wind，毕马威分析

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 养老负担加重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老龄化现象加重，并呈现出三大特点。首先，我国老龄人口占比上升，规模大，中国正面临未富先老的现象。根据七普数据，全国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8.7%，较2010年上升5.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3.5%（图3），较2010年上升4.6个百分点。按照国际上的认知，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10-20%之间，属于轻度老龄化阶段³，当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老龄人口规模也非常庞大，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大于美日德法英韩6个主要经济体之和（图5）。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020年我国人均GDP为10,504美元，而日韩达到相似老龄化比例（65岁及以上占比13.5%）的时间分别为1993年、2016年，当时其人均GDP分别为35,766美元、29,289美元，远高于我国目前水平，中国正面临未富先老的现象。

图5 主要经济体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及其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毕马威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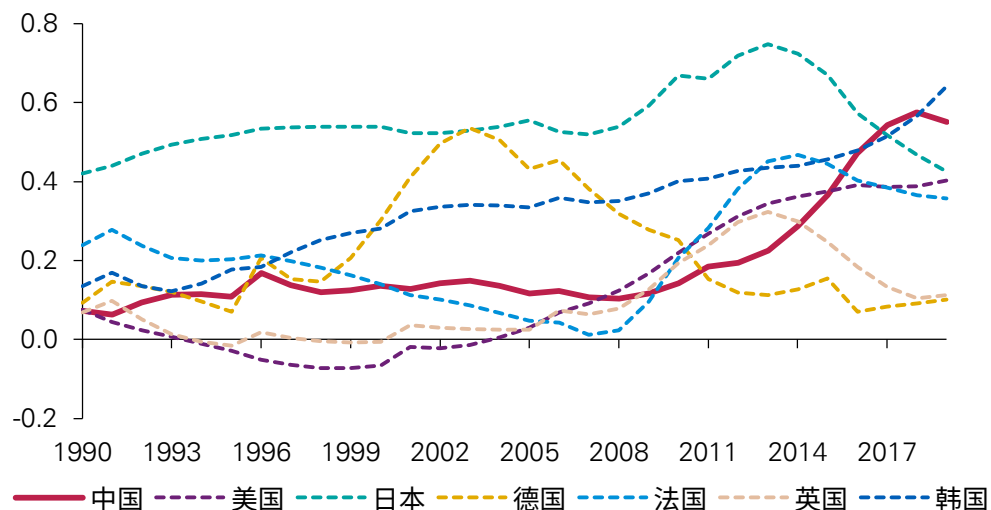
注：中国数据来自七普公布的2020年数据；其他国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公布的2019年数据。



³ 2021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国家统计局，2021年5月17日，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105/t20210517_1817559.html

第二，我国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位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前列。七普数据显示，2010至2020年间，我国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与六普相比，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速度分别加快了2.5和2.7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六普相对于五普，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幅度仅提升0.5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8年后我国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2017年增速超过日本，目前在主要经济体中增速仅低于韩国（图6）。

图6 主要经济体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增长百分点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毕马威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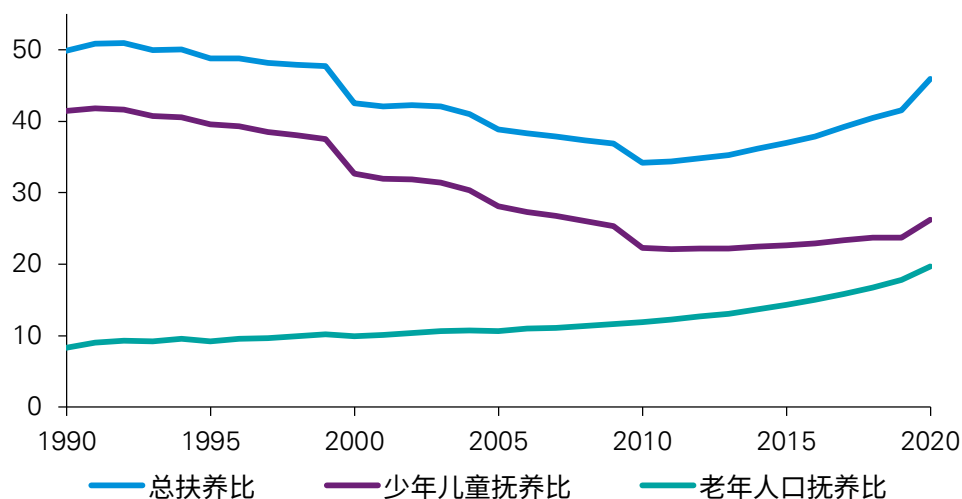
第三，家庭小型化使得居家养老压力大，养老负担加重。由于少儿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劳动年龄人口的育儿养老负担不断加重，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从2010年的34.2%大幅上升至2020年的45.9%（图7），其中少儿抚养比上升3.9个百分点至26.2%；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7.8个百分点至19.7%。长期以来，我国养老形成“9073”的格局，即90%左右老年人居家养老；7%左右社区养老；3%左右入住养老机构⁴。而七普数据显示，2020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人，比2010年的3.1人减少0.5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加重传统的老年人居家照料压力。此外，老龄化加快也将增加养老金的支出，加大财政支出压力，据中国保险业协会预测，未来5-10年中国预计会有8-10万亿养老金缺口，并且随着时间推移，缺口将会不断扩大⁵，或将增加政府债务以及财政赤字。

⁴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医养结合工作进展成效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2021年4月8日，<http://www.nhc.gov.cn/xwzb/webcontroller.do?titleSeq=11374&gecstype=1>

⁵ 《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研究报告》，保险业协会，2020年11月20日，http://xw.sinoins.com/2020-11/20/content_371536.htm



图7 人口抚养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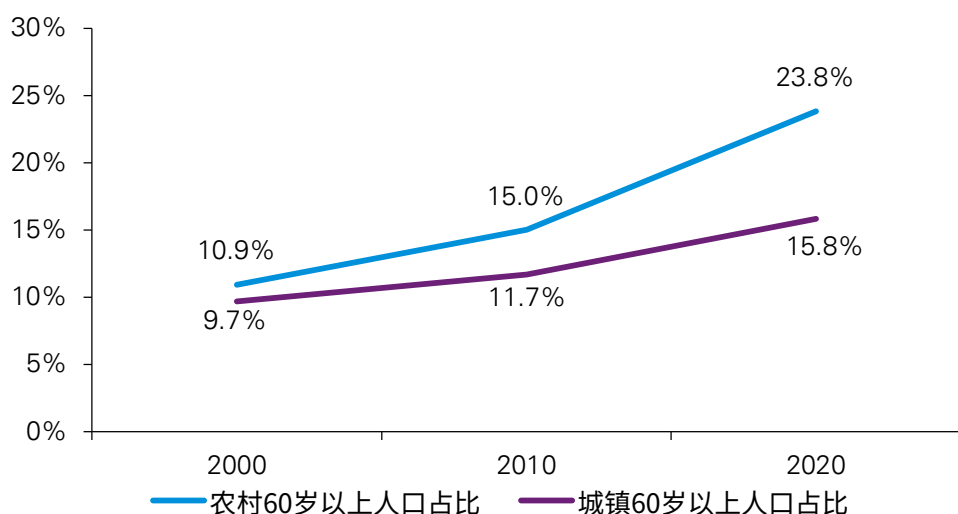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统计摘要》，Wind，毕马威分析

老龄化存在区域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老龄化问题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农村老龄化更为突出，省市间也存在差异。

一方面，城镇化加速的同时也使农村的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人口学家罗杰斯提出的“年龄-迁移率”模型⁶发现，人口迁移率在30岁左右的青壮年时期达到顶峰，此后随年龄增长逐步降至较低水平。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是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由于城市工作机会更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吸纳了大规模来自农村的劳动人口，年轻人进城就业是整体趋势。大量劳动年龄人口向城市迁移，使中国农村地区老龄化明显高于城市地区（图8）。2020年全国乡村地区60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分别达到23.8%、17.7%，分别较城镇地区高约8个百分点和6.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教育、就医等公共服务供给与户籍挂钩，也增加了农村老人、儿童随迁进城的壁垒，加重了农村养老、医疗、育幼的负担。

图8 中国城、乡老龄化呈现明显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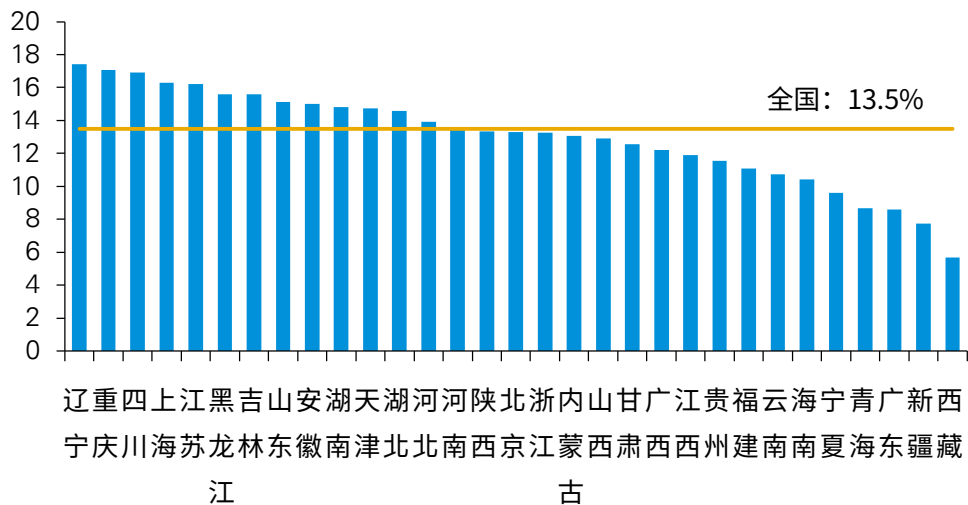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毕马威分析

⁶ Migration, urbanization, and spatial population dynamics, Rogers, A. , & Castro, L. J., 1984

另一方面，人口流动也带来了区域间年龄结构差异。七普数据显示，当前我国跨省流动人口为1.2亿人，人口流动也使得各个地区在年龄结构上呈现出区域化的差异。以人口流出较多的东北地区为例，大量年轻人前往其他地区工作生活，老龄化现象更为突出，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6.4%，较2010年提高了7.3个百分点（图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人口流入数量最多的广东地区，相比之下人口老龄化并不显著，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8.7%，仅高于西藏的5.7%以及新疆的7.8%。

图9 2020年各省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毕马威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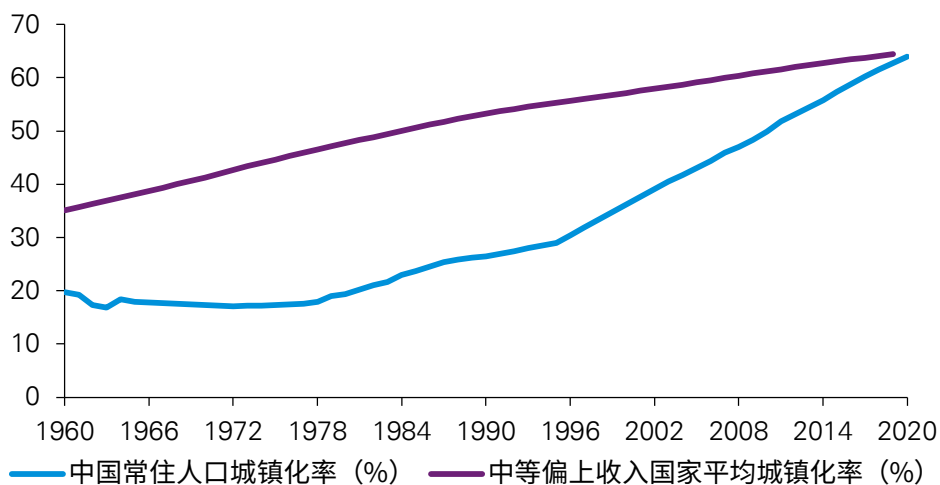
趋势三

城镇化加快

城镇化率加速上升

城镇化往往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同步发生，表现为劳动力由农村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城市非农业部门转移，在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再配置过程中提高了经济效益。七普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由2010年的50%达到2020年的63.9%，年均增速1.4%，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从国际比较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进程迅速加快，不断缩小和世界的差距。1980年时我国和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城镇化率的差距高达28.3个百分点，到2019年时该差距已经缩小到不足2个百分点，目前已经基本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城镇化水平（图10）。“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5%。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引导下，我国城镇化进程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不过也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农村老龄化现象更为突出，未来劳动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增速可能放慢。

图 10 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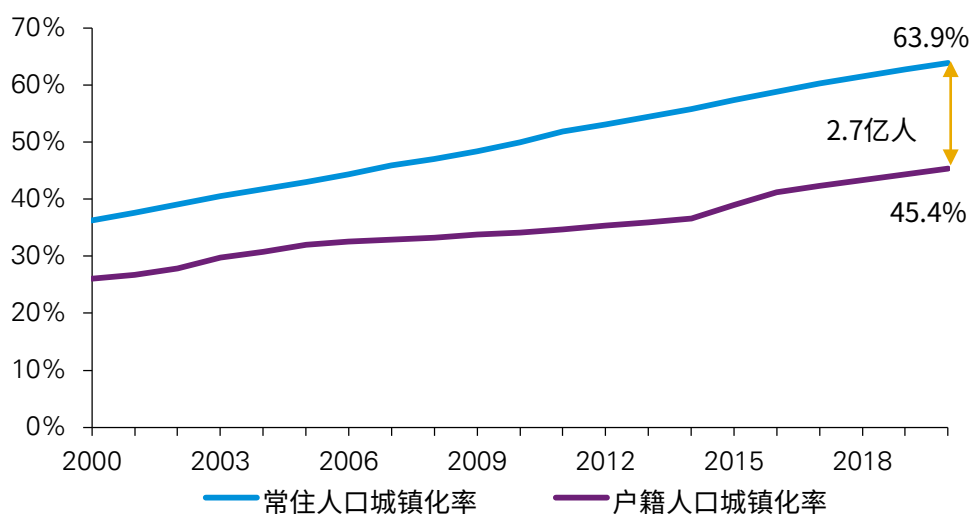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统计摘要》，世界银行，毕马威分析
注：中国数据截至2020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数据截至2019年。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望释放更大红利

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人口自由流动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户随人走”的户籍管理方式，在我国户籍制度体系下，人口流动通常表现为由非户籍流动到户籍迁移的“两步走”形态，因此使得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长期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0年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39.3%提升至45.4%，提升幅度显著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意味着约有2.7亿城镇居住人口尚未在常住地落户。

近年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也在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2016年至2020年每年增速均高于1%（图11）。“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继续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方面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动消费发展。有研究测算，如果可以使我我国各级城市的平均迁入成本降到与深圳、东莞类似的水平，可以使我国实际GDP增长11.5%，城镇化水平提高6.8%⁷。此外，针对当前城市流动人口中农民工、快递员等灵活就业人员比重较大的特点，李克强总理在5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强调加快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放开就地参保的户籍限制。解绑公共服务的户籍限制，有助于推动流动人口在城市享有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服务，进而消除劳动力在城市间合理流动的顾虑，减轻流动人口的迁徙成本。预计未来我国将继续以渐进式改革，推动人口向自由流动过渡，从而优化劳动力要素资源配置。

图 11 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统计摘要》，Wind，毕马威分析

⁷ “我国人口迁移成本、城市规模与生产率”，王丽莉、乔雪，《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19卷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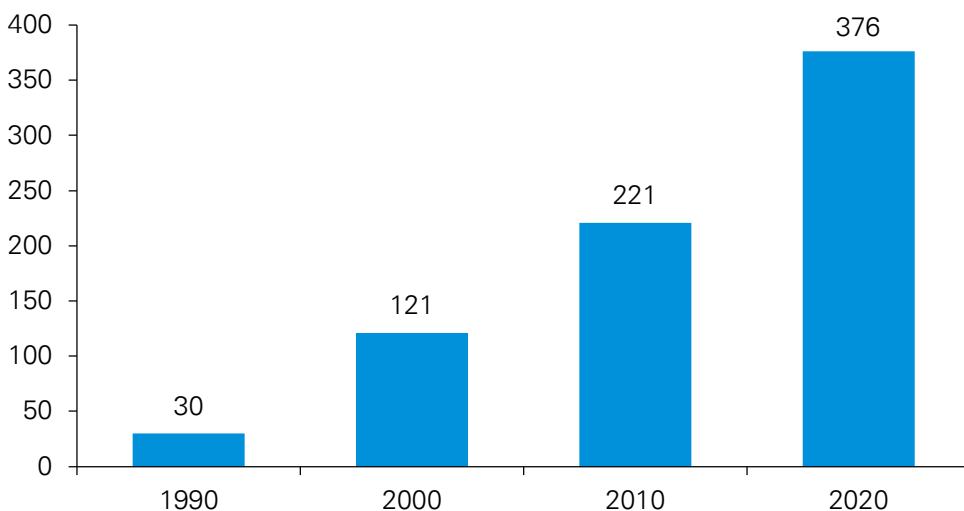
趋势四

人口流动加快

人口流动加快，省内人口流动增长迅速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也更为活跃。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共有流动人口3.76亿人（图12），较2010年六普增加69.7%，意味着我国约每四人中便有一人为流动人口。其中，2.5亿人为从乡村到城镇的流动，较2010年增长1.1亿人，在总流动人口中占比达66.2%。反映了我国城镇经济活力正在不断提升，人才资源配置水平提高，城镇吸纳人口迁入包容度加大。

图 12 流动人口规模，百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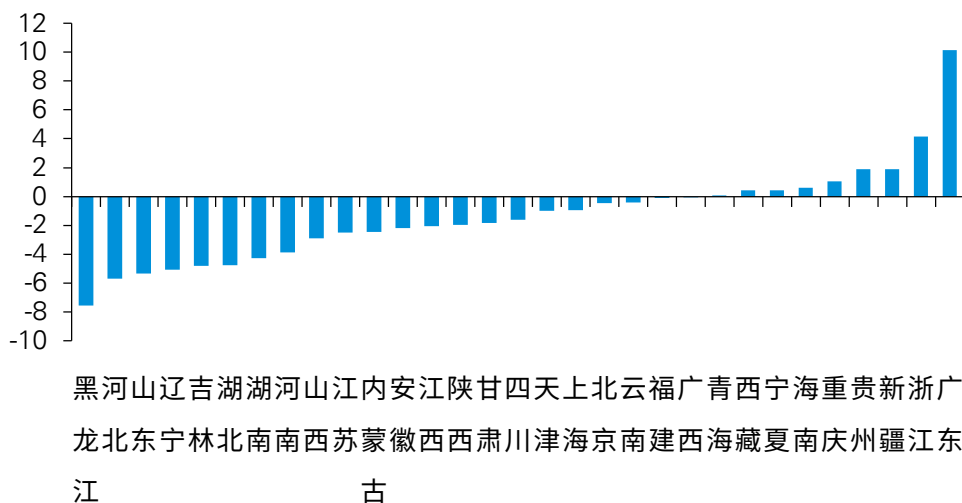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毕马威分析

此外，七普数据显示省内人口流动超过跨省人口流动。2020年我国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2/3，较2010年增长85.7%，明显高于1.25亿人跨省流动的规模和45.4%的增速。更多人选择相对近距离的省内流动，与近年来我国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鼓励重点省份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密不可分。一些中、西部中心城市在政策的支持下，通过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培育特色产业，也使家乡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好，吸引了大量劳动力留在省内流动。例如，四川作为我国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近年来随着现代制造业蓬勃发展，大量劳动人口更倾向选择在近距离的省会成都就业。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成都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位列全国城市人口第四名。成都平原经济区常住人口占四川省总人口比重超过50%，人口向省内核心城市集聚。预计未来五年，我国将继续鼓励重点省份创建国家中心城市，并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发展，促进人口、产业合理分布。

区域间人口变化存在差异

七普数据显示，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比重近40%，中部地区占25.8%，西部地区占27.1%，东北地区占约7%。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个百分点。劳动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就业机会、自然环境、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存在紧密联系。过去10年间，东北地区劳动人口减少较为明显，而广东、浙江、新疆、贵州、重庆、海南等地劳动人口增长最多（图13）。

图 13 2010年至2020年间各省市15-59岁人口数量变化，百万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毕马威分析

七普调查显示，东北三省在2020年的总人口较2010年下滑近1,100万，其中15-59岁人口数量在过去十年间下降超1,750万。作为资源大省、老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由于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相对单一，近年来在整体宏观经济转型中面临较多挑战，增速放慢，东北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9.9%下滑至2020年的5%。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是东北地区劳动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前东北地区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阶段，通过深化改革、提高营商环境等措施，可以激发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改善人口状况。

另一方面，广东、浙江两大沿海省份的常住人口和劳动人口数，无论从绝对值、增长率还是全国占比来看，均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态势。广东省2020年15-59岁人口数量较2010年增长超1,000万，并带动常住人口总量增加2,170万，相当于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总量。浙江新增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其中15-59岁人口数量增长超400万。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港口众多，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东部沿海地区自古便是人口大省。较多的人口也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广东、浙江两省2020年GDP占全国比重超17%。此外，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经济发展状况好，城镇化率水平高，良好的城市间协同效应加剧了人口向该地区流动，进一步形成良性循环。随着创新对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东部地区高技术、新兴产业将保持较高增速，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潜力也将进一步吸引高学历人才向东部地区集聚。



此外，贵州、重庆两地人口较2010年分别增长11%，扭转了六普中下降的趋势。贵州在过去十年间生育率保持在较高水平，0-14岁人口占比高达24%，居全国第二；此外，贵州15-59岁人口较2010年增加188万，也是贵州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贵州人口的增长与交通条件大幅改善有很大关系。历史上贵州便是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是连接云南与湖广等内陆省份的重要通道。过去十年间，政府高度重视道路建设，贵州在2015年成为西部地区第一个“县县通高速”的省份⁸。发达的交通网络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除去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近年来贵州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8%以上。另一方面，近年来贵州致力于打造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政策的支持下，贵州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华为、腾讯以及阿里巴巴等国内科技巨头企业也将大数据中心设在贵州。贵州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此地发展。

重庆人口位列全国城市之首，作为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地，曾经向东部沿海地区输送了大量劳动人口。近年来在政策的支持下，该地区充分利用长江区位优势，承接了大部分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升级，劳动力有所回流，人口实现稳步增长。经过十年的努力，目前重庆已形成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15-59岁人口数量较2010年增加103万，并带动常住人口总量较2010年增加11%。预计未来随着西部地区着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长江经济带将释放巨大潜力，集聚更多人才。

海南省在自贸港建设政策落地的利好影响下，发展潜力正在逐步释放出来，叠加优惠的人才引进政策，各类人才陆续向海南自贸港集聚。2020年海南省总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较2010年提升140万。其中，15-59岁人口提升近62万。尽管在人口集聚和经济总量上，目前海南与其他沿海省份和主要城市群仍存在较大差距。但自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后，海南自贸港新增市场主体同比增长30.9%，新设企业增长113.7%，位列全国第一。预计未来海南自贸港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推进“海澄文定”综合经济圈、“大三亚”旅游经济圈的建设；同时发挥区位优势，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并着重加强科建设，形成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3+1”的产业发展格局。我们认为，包含海口、三亚在内的海南城市群也将在建设自由贸易港战略的支持下，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增长极，继续吸引人才集聚。

⁸贵州“县县通高速公路”，中国政府网，2015年12月，
http://www.gov.cn/xinwen/2015-12/31/content_5030059.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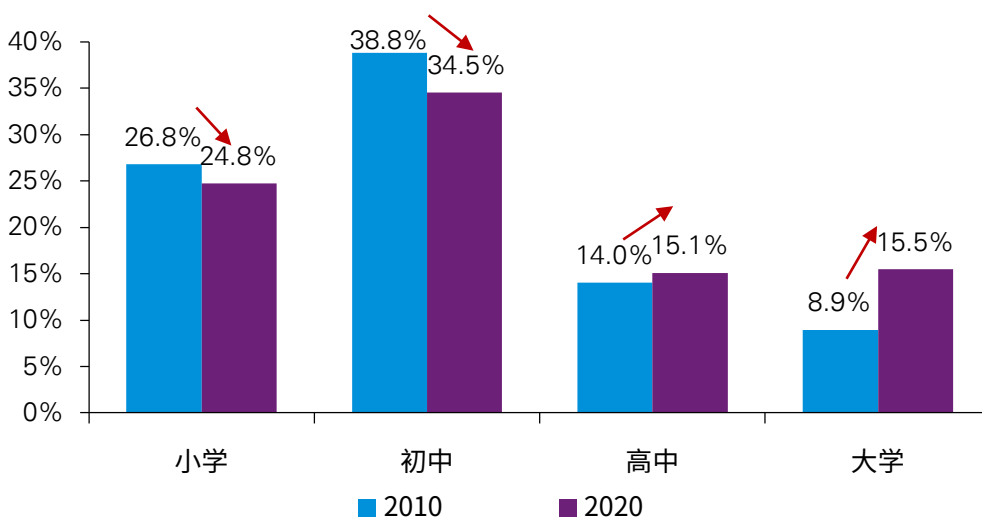
趋势五

人口素质提升加快

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据七普数据，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10年的9.1年提高至9.9年，文盲率由4.1%下降为2.7%，九年基础教育更加普及。从具体的受教育程度来看，与2010年相比，拥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增长最多，由8.9%提高至15.5%（图14），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发展；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也由14.0%提高至15.1%。相应地，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由38.8%回落至34.5%；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由26.8%回落至24.8%。

图 14 2010年和2020年各教育程度人口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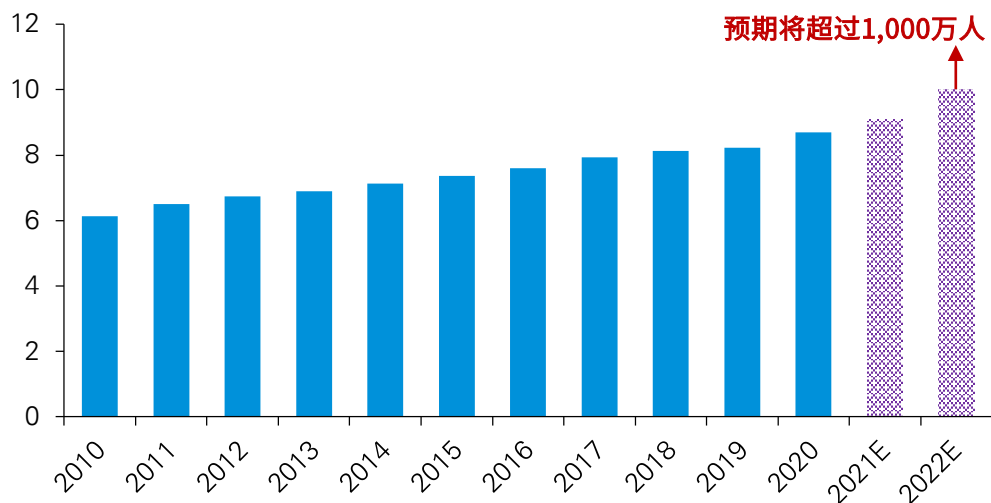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毕马威分析

据七普数据，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8年，比2010年的9.7年提高了1.1年。其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到了3.9亿人，占比为43.8%，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学历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达到了23.6%，也比六普提高了11.3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对科技创新、研发都起到拉动作用。我们认为，人才红利将逐步得到释放，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的人口红利减退的问题，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支撑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就业市场存在一定结构性压力

随着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数量越来越多，根据教育部最新预测，2021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将达到909万，到2022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将超过1,000万人⁹（图15）。但另一方面，创造合适的就业岗位，解决大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是一个挑战。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0》数据显示，2019年的全部失业人群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27.8%，特别是处在20-24岁年龄段的年轻失业人群中，有61.8%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而小学和初中学历占比分别为1.1%和14.7%。出现这种现象有几点原因。首先，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兴起，外卖、快递等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为一些较低学历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其次，我国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之中，高等教育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但我国目前大学普遍还是通识教育，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一些毕业生掌握的能力和工作岗位要求存在差异，这也导致我国就业市场存在一定结构性压力。例如，一方面年轻人就业依然面临一定困难，例如3月份16-24岁年轻人的调查失业率13.6%，高于去年同期水平。但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一项针对9万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显示，约44%的企业反映招工难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创近几年来新高¹⁰。

图 15 我国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包括专本硕博），百万人



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统计摘要》，Wind，毕马威分析

⁹预计2021年将首次突破900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新空间在哪，经济日报，2020年12月14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012/14/t20201214_36110787.shtml

¹⁰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国新办，2021年4月16日，<http://www.scio.gov.cn/xwfbh/xwfbh/wqfbh/44687/45283/index.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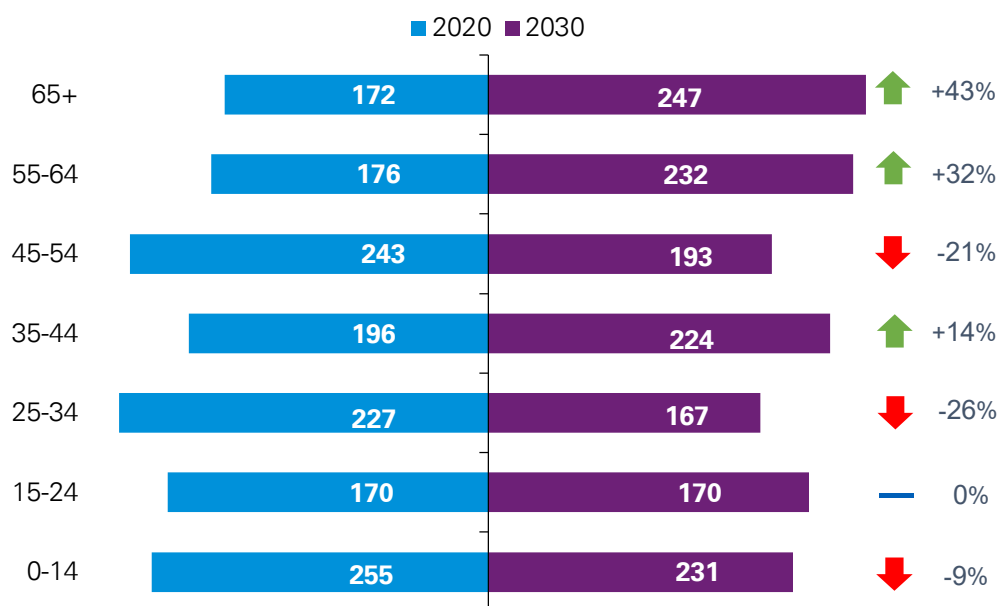
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和机遇

人是经济活动的最终主体，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口和人口结构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人口结构变化也将影响未来行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一老一小消费市场广阔

根据联合国对中国2020-2030年间人口变化的预测，未来10年间35-44岁、55-64岁、65岁及以上几个年龄段人口数量增长最快（图16）。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带来消费结构的改变，我们认为婴幼儿消费、银发经济这一老一小市场空间广阔，同时，家庭规模缩小也带动了单身经济、宠物经济等消费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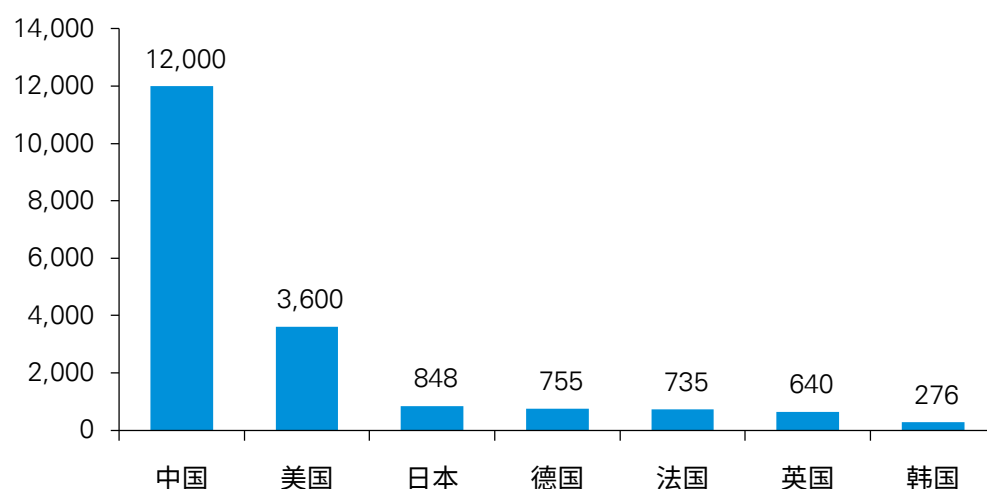
图 16 中国各年龄段人口规模预测，百万人



数据来源：UNWPP 2019，毕马威分析

首先，我国近年来人口出生率虽然有所下降，但2020年仍有1,200万新出生人口，约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韩国6国新出生人口总和的1.8倍（图17）。5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放开三胎，并将重点推出税收、住房等配套支持措施，随着后续生育政策在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等成本方面发力，有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适龄青年生育积极性。同时，越来越多的90后甚至00后将成为父母，成为育儿消费市场的主力。他们普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更加注重科学育儿和品质消费，推动育儿产品的消费升级。此外，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也将需要独立育儿，这也给普惠托育、智能玩具、育儿生活护理等细分市场带来新的增长点。

图 17 2020年新出生人口，千人



数据来源：各国政府统计部门，毕马威分析

注：英国为2019年数据。

其次，联合国数据预测未来10年我国将增加1.1亿60岁以上老龄人口。中国老年人口庞大，老龄化进程加快，是我国人口面临的一大重要挑战，但老龄人口的增加也扩大了老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使得银发经济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除了带动医疗、康养等相关行业之外，老年人对休闲娱乐、旅游等需求也越来越强烈，甚至许多老年人退休之后进入老年大学等教育机构来获取知识和培养兴趣，老龄教育服务行业应运而生。

此外，中国家庭户规模缩小，2020年平均家庭规模为2.6人，比2010年的3.1人大幅减少了0.5人，这也带动了单身经济、一人食、自嗨锅、宠物经济等新消费业态的发展。

国货品牌快速崛起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内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以及中国文化魅力的彰显，中国消费者对国货品牌的关注度明显提升，百度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9年的十年间，消费者对中国品牌关注度几乎翻倍，从38%增长到70%，甚至超过了对境外品牌的关注度¹¹。特别是对于80后、90后来说，他们在中国经济和数字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成长，拥有更高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感、自豪感。此外，年轻一代消费群体更加注重个性化的表达，勇于尝鲜，是中国品牌发展最主要的关注者。未来10年，这些年轻一代消费群体普遍处于35-44岁区间，也是增长最快的人口区间之一，这个年龄段消费群体的增长为中国品牌的崛起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空间。

为了迎合年轻一代消费升级的需求，国货品牌的质量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快速创新的优势，也使得国货品牌可以更快速地洞察消费者需求、打造“千人千面”的营销模式、加强个性化定制的产品输出，从而提升品牌价值。如今的国货产品已经褪去“无趣”和“廉价”的刻板形象，国货品牌也代表着“新潮”和“高品质”。我们预期国货品牌价值将迅速增长，新国货全面崛起指日可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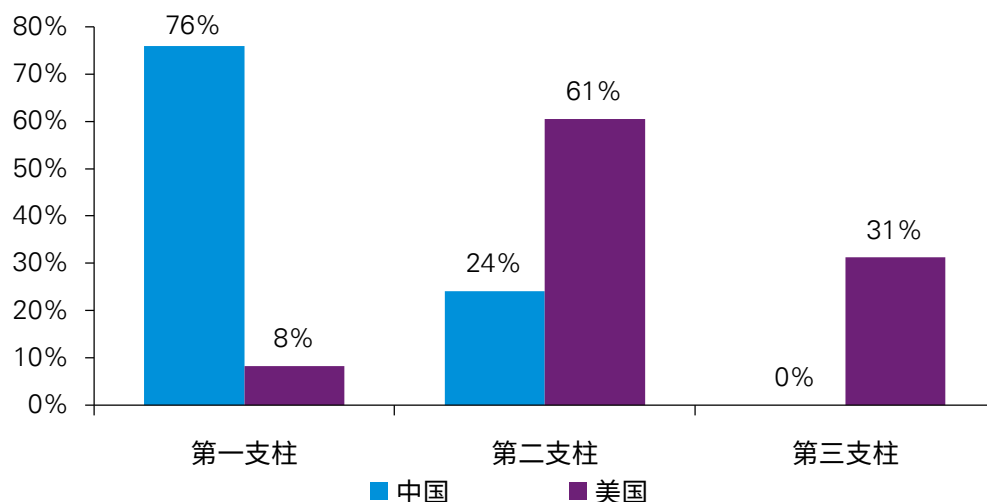
¹¹详见《奋楫者先：“十四五”规划宏观趋势与机遇》，毕马威中国，2021年4月，<https://home.kpmg/cn/zh/home/insights/2021/04/14th-five-year-plan-macro-trends-and-opportunities.html>

社区养老和商业养老保险大有可为

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压力，“十四五”规划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如何破解中国目前的老龄化矛盾，可以从几个方面推进。首先，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随着计划生育时期出生的独生子女逐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家庭养老的负担也日益加重，加强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可以帮助缓解一些对家庭的压力。对于社区养老，可以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对于机构养老，可以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力度，多措并举扩大养老机构床位供给，提升养老机构的专业服务能力。

其次，加大二三支柱养老金的推进力度。我国三大支柱的养老金体系发展很不平衡，呈现“头重脚轻”的现象，以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为主的第二支柱参保覆盖面仍然较窄，只能满足小部分群体的养老需求；由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构成的第三支柱参保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据2019年数据，我国养老金第一支柱占比逾七成；第二支柱占比不足三成；第三支柱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美国等发达国家养老金体系已经走向以二三支柱为主导的商业化模式（图18）。未来我国亟需加大对二三支柱养老金的推进力度，促进养老金体系更均衡、更可持续的发展。

图 18 2019年中美多支柱养老保险占比，%



数据来源：人社部，社科院，毕马威分析

注：中国养老金第一支柱包括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及全国社养老老储备基金。



自动化、智能化升级加速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劳动人口的比例和绝对量都出现下降，较低的生育率也将影响我国未来劳动力人口增长。劳动力作为主要生产要素之一，劳动力数量的下降会推升劳动成本，但也将加速企业自动化升级的步伐。疫情后制造业企业正在加大资本开支，例如今年前四个月，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8%，明显快于房地产、基建等投资门类。可以看到，企业正在加大投入提升机械设备自动化水平，减轻对人口成本的依赖，预计未来工业自动化装备市场前景广阔。

此外，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面对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以及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着重强调的数字化转型，传统产业也将加速向智能、高端升级，以提升国际竞争力。目前许多行业龙头企业已经从早期的数字化尝试，演进到数字化贯穿企业的各个部门，并积累了大量数据。在此基础上，企业可以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适用技术，更好地挖掘和利用数据资产价值，助力产品和服务创新，发现新的业务和商业模式。另外，智能化转型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生产和服务、发现新的需求，还可以帮助提高企业的敏捷能力，以应对全球市场的快速变化和技术的不断更新，推动企业提质增效。

人才红利推动创新发展

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推动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十四五”规划指出，创新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核心驱动。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加强基础研究，攻关核心技术，切实提升关键领域自主可控能力，是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和挑战，而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根本。过去十年间，我国拥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增长最多，由8.9%提高至15.5%。企业应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的作用，利用好当前的人才红利优势，加大对人才投入力度，加强对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的人才培养，以提升在未来创新发展中的市场竞争力。

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引进高端人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创造出更多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进一步形成人才红利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通过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建立产业创新中心等模式，对基础学科、关键技术和前沿领域进行研究和攻关。这能够促进产学研相互融合，全面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同时也有助于企业加快成果转化能力，助力国家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联系人



康勇

首席经济学家
毕马威中国

☎ +86 (10) 85087198

✉ k.kang@kpmg.com

研究：曾远, CFA; 郑亚男

设计：朱政

感谢吴爱旌（实习生）对本文贡献

kpmg.com/cn/socialmedia



如需获取毕马威中国各办公室信息，请扫描二维码或登陆我们的网站：
<https://home.kpmg.com/cn/en/home/about/offices.html>

本刊物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 2021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在中国印刷。

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为毕马威全球性组织中的独立成员所经许可后使用的商标。

二零二一年六月印刷